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高王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众多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曾影响到她的许多方面。在近几十年即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从5亿增加到10亿以上，在总量上超过了1800年的世界人口。这一增长的基础，主要即是在近几百年特别是在清代打下的。其间人口增长的数量也和其他一些数据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及有关的许多问题。

在明清时期人口增长数量的研究中，有几个数值最为重要：(1) 明代初年的人口；(2) 明代后期的人口；(3) 清代初期的人口；(4) 清代后期的人口。

明清时期的官书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人口记载，现将明代人口表列如下：

表1　明代人口数量（1368—1644）　**单位：万人**

洪武14年（1381）	5987	成化22年（1486）	6544
洪武26年（1393）	6055	弘治元年（1488）	5021
永乐元年（1403）	6660	弘治17年（1504）	6011
永乐10年（1413）	6538	嘉靖31年（1552）	6334
永乐12年（1415）	5162	隆庆元年（1567）	6254
正统元年（1436）	5232	万历6年（1578）	6069
天顺4年（1460）	5375	万历30年（1602）	5631
天顺8年（1464）	6050	泰昌元年（1620）	5166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1、52—64。原资料中洪武年间和嘉靖以后为断续统计，其余为连续统计。〕

如同其他官方统计数字一样，历史人口统计的首要问题，仍是数字的可靠与否。从表一可以看出，明代人口数量似乎交错呈现为两条水平的直线，一条保持在6000余万人的水平线上，一条是在5000余万之上；或不如说，明代人口始终保持在5000—6000余万人之间，这就给其可靠性带来很大的问题。其中，只有对于洪武朝的统计，史家一向认为比较可信。如何炳棣认为，它无论就调查统计的条令规则还是实际效果，都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洪武末年的实际人口，至少已超过6500万人；①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认为，这一数字当在6500万至8000万人之间。②

永乐元年（1403）中国册载人口已达到6600余万，其后就始终在6000万上下波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何炳棣分析是因为统计的重点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实际上只包括一部分人口（纳税人口），此外还有种种原因造成了严重的隐漏等等。这样就使对明代中、后期人口的任何估计都失去了统计数字的依据，而只能综合其他各方面因素进行推算。据他

推测，到 1600 年即明末战乱爆发以前，中国人口可能有 15Q00 万左右，较明初增加了一倍或者稍多；③珀金斯估计在 12000 万—20000 万之间；④严瑞源（Shu－Yuen Yim）从明末救荒统计发现官方人口统计数字过于偏低，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应稍为超过 2 亿，因此王业键认为，珀金期估计的上限，即 1600 年 2 亿左右，当较接近史实。⑤

从以上各方面情况看来，明初中国人口当有 7000 万以上，但到明代末年恐怕不会有 2 亿之多，而只居一个较低的数值（如在 15000 万左右）。这是因为，对比明清两代的经济发展，清代无论在数量上（如耕地的开垦）和质量上（如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较明代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就此而论，人口增长方面一定也有相应的表现（这是对比明代的增长和清代的“纯增长”，即不计入明末清初的人口损失而言）。

自从明代初年以后，人口统计愈来愈与赋役统计合流，致使其统计对象愈来愈成为一个纳税的单位，而非真实的人口；⑥甚至在清初至 18 世纪初的近 一百年时间里，只存在人丁统计而没有人口调查。如顺治 8 年（1651）计有人丁 1063 万丁（是为清代人丁统计之始）；16 年（1659）有 1901 万丁（是年始有全国数字）；以后直至康熙 23 年（1684）始增至 2000 万丁；47 年（1708）增至 2100 万丁（是年突增 100 余万）；其后逐渐增加，至雍正 12 年（1934），增至 2736 万丁。⑦于是清初人口数量的估计自然就成为一个难题，并引起许多争论。如据何炳棣估计，1700 年中国人口约有 15000 万左右；⑧珀金斯认为，1650 年中国人口在 10000 万到 15000 万；⑨王业键主张采纳其上限 15000 万；⑩赵冈认为，清初（康熙元年）人口约有 8000 余万；⑪高王凌认为，大约在康熙 20 年代（约 1682 年左右），中国人口约有 7000—8000 万。⑫

在上述估计之外，长期以来一直还存在着另一种估算方法，即“以丁折口’，即是将某年人丁数乘以 4、5 或 6 等等据认为是合理的数字，从而得出人口总数。但这一做法忽视了人丁的涵义及其统计的不可靠等问题。关于前者（尤其是明代情况），何炳棣已有精辟的分析。对于清代人丁编审的实质，从分析各地的实际情况，也可做出清楚的说明。

清代人丁编审只包括各直省的“腹民”，这与明代和清代后来的人口统计是大体一样的。但在 18 直省内地民人中，也有许多不入编审，如所谓“贱民”、“佣保奴隶”、“流寓”人口、以及优免丁徭者，后两者在人口中已占有不小的比重；同时也有多编者，如江西、福建、广东的女口（因收“盐钞银”）。至于应编的人丁，虽有一定的规则，实际上各地却“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如广西省，以及广东、四川、浙江、河南的许多州县，还有湖南、江苏、湖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的若干地方，在清初即实行丁随地派，这显然与明末的一条鞭法大有关联。在地丁分征的地区，南北方也各有不同。如江南是按户定丁，实际是照产派役；而北方多数地区，似乎最接近统计 16 至 60 岁男子的编审“定制”，但实际上，也是“丁粮并核”，部分参照地亩情况。特别是人丁编审中像统计耕地亩数一样，也存在着照依“原额”，即一以原额为准，只求足额或稍稍溢额的现象，这就使人丁编审即使在最严格的地区也很难准确。总之，清代丁税乃是一种兼顾丁、田两方面因素，既征之于丁又征之于田的税收项目。所谓丁额，只是这样一种税收的数额，而不是什么成年男子（丁）。对于人丁统计的可靠性，清人自己也是不相信的；原因之一，即是因照依旧额而引起的人丁增长率过低。这样就使人丁增长的曲线与人口实际增加的曲线二者不能“平行”，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断难以一个固定的丁口比例关系去加以推算。⑬

对于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凭空估计或利用人丁数字恐怕都不是好的方法。另外可做的一个选择就是利用较近时期的其他数据，如乾隆年间的人口统计进行推算（这里是做逆推）。这一做法需要找出几个乾隆年间的较为准确的数值，算出年平均增长率，再根据各方面史料给出一个康、雍时期的增长率（事实上它比乾隆年间略高），这样就可以“前推”出前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据我估算，在 1682 年即平定三藩、大规模的朝代鼎革战争基本结束之际，中国人口大约有 7000—8000 万，到 1700 年大约有 9000—10000 万左右。⑭

这里应指出，1741 年以前清朝并不是仅有年度的人丁统计，各地仍有一些人口数字的调查，载入“朝觐须知册”内上报朝廷。只是它们往往非常零散，并不大受重视。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一部方志中留下一份当时的全国人口数字：“……今天下人户口七千一百三十九万八千六百九十口，较之秦什伍汉乡亭唐宋里甲倍之。然其数实籍之群邑，……”⑮对于这样一类的史料，显然还应引起学者的更大重视。

乾隆 6 年（1741）以后，清朝有了逐年调查的人口数据，是年发现中国人口已有 14000 万人以上，而不是过去以为的几千万丁。以后逐年上升，至乾隆 27 年（1762）增至 2 亿；40 年（1775）增至 26456 万，这年人口突增出数千万，表示其后统计更为严密认真。至乾隆 55 年（1790），突破 3 亿。后因白莲教事件一度下降，至嘉庆初回复如故。⑯此后中国人口直线上升，到咸丰元年（1851）已达到 43000 万之众。其后由于战乱破坏，人口耗减，同时由于保甲人口登记废弃，统计质量也大为下降。⑰因此只有咸丰以前的统计还算是比较正规。关于包括 19 世纪中叶在内的清代人口统计的可信程度问题，历来就有两种意见，但占上风的还是认为统计结果偏低，实际数字可能还要高些。如清人王庆云认为：“案各省册报民数，固不能一无舛漏，大抵有少开而无多报”。⑱这一说法，现在受到了施坚雅（G. Willam Skinner）的有力挑战。他主要依据对嘉庆以后四川人口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 19 世纪中叶中国人口统计结果偏高的结论。再考虑进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 5 省的情况，他估计 1851 年中国人口并没有 43000 万，而只有 38000 万左右。⑲

确实，清代的人口统计，即使是在行政最有效率的年代里，也存在有许多问题。例如在年度之间以及省区之间，都有许多矛盾或失误之处。不过也应看到，在这点上是分得越细，“毛病”也就越多。而且在统计结果上，也是偏高和偏低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的。所以，分省的甚至分州县的分析固然重要，但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倒是越笼统越可靠些。例如，在上列统计偏高的省份之外，在 19 世纪有一些省份的人口统计显然是偏低了：如直隶人口在嘉庆以后即大为减少；河南户口在嘉庆以后不再变动；山西户口自 18 世纪末以来很少增加；甘肃户口自 18 世纪末已不再变动；贵州亦然；广西户口自嘉庆后也不再增加，这 6 省情况从各方面讲都是说不过去的（详见表 2）。其实，就是前列四川等 6 省中是否完全夸大，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如江西户口自嘉庆以后就变动很小，嘉庆朝的增加也多半是反映了前朝统计的不足；而以刘翠溶研究江南族谱所得到的平均增长率 10‰计，⑳四川人口从清初到嘉庆朝的增长也不是不可信的（如清初按 1673 年 300 万人计，见施坚雅文）。

表 2　6 省人口变动　（单位：千人）

省份	1791 年	1812 年	1851 年
直隶	23697	27991	23455
河南	21496	23037	23928
山西	13387	14004	15693
甘肃	15172	15193	15440
贵州	5183	5288	5436
广西	6647	7314	7823
6 省总数	85582	92827	91775
6 省指数	100	108	107
全国指数	100	119	142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 82，等〕

因此，施坚雅提出的对于 19 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数量的质疑，还应看做一个新的研究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综合上述情况，我认为在 1850 年左右，中国人口即令应比官方统计数量要少，也不会低于 4 亿。

明清两朝特别是清代中国人口的巨大变动，自然不仅仅在于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反映在人口的地区分布上。比较明代和清代的人口分布图即可看出，在近几百年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是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汉代统计北方人口曾占全国人口的 90%（公元 2 年）。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向南移动，到宋代已移至江南，南方人口达到全国人口的 36%（1080 年）。明代所接续的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其间较重大的变化之一，是元末以来华北大平原以及四川、云南等地遭到较大的破坏，成为政府组织移民的重点。当时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有江苏、浙江、江西和山西等省，也成为向外移民最多的地区。

明代人口分布的变化由于缺乏人口数据而难于进行前后对比，也许利用清代的分省数字（最早是 18 世纪中叶的），可以做出一些说明（详见表 3）。大体说来，明代形成南、北两京对峙，以大运河贯通其间的格局，经济与人口的重心较偏于东部运河沿线省份（南北直隶、山东、浙江，若加上江西、福建，占据全国人口 2/3，见表 3）。这种局面到清初并没有多大改变。

表 3　明清两朝的人口分布　（单位：千人）

	1393 年		1749 年		1851 年	
省份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河　北	1927	3.18	13933	7.85	23455	5.43
山　东	5256	8.68	24012	13.53	33266	7.70
江　苏	7616	12.57	20972	11.82	44303	10.26
安　徽	3140	5.20	21568	12.15	37631	8.71

省份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人口	比重
浙　江	10488	17.32	11877	6.69	30107	6.97
江　西	8982	14.84	8428	4.75	24516	5.68
福　建	3917	6.47	7620	4.29	20099	4.65
山　西	4072	6.73	9509	5.36	15693	3.63
河　南	1913	3.16	12848	7.24	23928	5.54
陕　西	2317	3.83	6734	3.79	12，010	2.78
甘　肃			5710	3.21	15440	3.58
四　川	1467	2.42	2507	1.41	44752	10.36
湖　北	4703	7.77	7527	4.24	33810	7.83
湖　南			8672	4.89	20648	4.78
广　东	3008	4.97	6461	3.64	28389	6.57
广　西	1483	2.45	3688	2.03	7823	1.81
云　南	259	0.43	1946	1.09	7403	1.71
贵　州			3075	1.73	5436	1.26

〔资料来源：梁方仲书，甲表69、78、82以及70、79、83。说明：本表只列入清代所谓18直省，以为比较之用，未列入东北、新疆等地。〕

利用清代早期资料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明清之际西北、华北和西南等地曾因战乱而发生变化，虽然经过一时期之后局面又有所恢复。但是若就明清两朝人口分布的对比而言，真正能够反映其变化的，是明代人口密集地区以西以南的中南和西南，以及稍晚一些东北地区的开发。

通过表3可以得知，中南和西南7省（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人口总数，仅以清代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而论，即由3000余万增加为15000万，增加了3倍多（同期内其他11直省人口只增加了1倍）；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则由19%增加到34%。到19世纪中叶，中国南方人口比重虽增至70%，但人口的东、西部对比已由明代的2：1，改变为大约各占50%（见表3前7省与后11省的对比）。

清代人口分布的变化不仅仅是局部地区地位的升降问题，这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清代耕地的统计数额比明代增加了将近1倍，在这种“全城性的开发”之下，当时几乎所有可耕土地都已得到开垦。上述的人口移动和地区变化即是与这一发展互为因果的。

清代人口移动还具有一些特点，这就是：（1）移民多由民间自主，而很少像明代那样由官府出面组织；（2）移民时间持久，波及范围广大，因而显现出其冲动力较强。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回答，清代那样的移民是怎样出现的？它的动力何在？当18世纪之初，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为多，为何却能越过明代的“开发线”，大规模地进入西南诸省？而对着人们对于清代人口繁多的一再批评，又应如何认识人口增加特别是其快速增长在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

……等等问题？

最后，我把综合各家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人口数据概述如下：明代初期（14 世纪末叶），7000 万人以上；明代后期（1600）年，15000 万左右；清代初期（1682 年），7000—8000 万；1700 年，9000—10000 万；1750 年，20000 万左右；1800 年，超过 30000 万；1850 年，40000 万以上。其中清代初年和 18 世纪的一段，无论在人口增加，移民以及与经济变化的关系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

①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 1 章。

②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附录 1。

③何炳棣，第 1 章、11 章。

④珀金斯，附录 1。

⑤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页 33，注 17。

⑥何炳棣，第 2 章。

⑦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74。

⑧何炳棣，第 11 章。

⑨珀金斯，附隶 1。

⑩王业键，同上。

⑪赵冈：《中国土地制史》，联经，台北 1982，页 144。

⑫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

⑬高王凌，1984；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1。

⑭高王凌，1984。

⑮顺治《封邱县志》卷 3。

⑯梁方仲，甲表 76、77。

⑰何炳棣，第 5 章。

⑱王庆云：《石梁余纪》卷 3《纪丁额》。

⑲施坚雅：“19 世纪的四川人口，来自未累计资料的教训”，《清史问题》1987：12。

⑳赵冈，页 131。